

我为农民增收办实事 | 本报记者一线聚焦

政府支持村民创业,昔日贫困的儋州铁匠村如今人均年收入过万 为工艺能手插上致富翅膀



8月19日,本报记者在儋州市木棠镇铁匠村,倾听村民讲述“发家史”。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记者手记

转变产业,政府还需扶一把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同样的石屋,同样的地理位置,也同样面临着传统产业没落的困境。然而,儋州的这两个村庄却迎接了不一样的命运。
铁匠村成功实现了转型,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6万元,而盐丁村不仅没能走出来,还在走下坡路,年人均收入仅为2100元。

一喜一忧,折射出的是整个儋州北岸地区老百姓的发展境况。

分析铁匠村的成功,我们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转型,一是在于村民的敢闯敢试。

铁匠村并不是没有失败过,做琉璃,遭遇过瓶颈;做牛角,遭遇过失败;做海铁树,也尝到过苦头。但就在一次次挫折中,不断尝试新的产业,最终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花梨木工艺品。

成功的因素之二是在于政府的扶持。

虽然,铁匠村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毕竟这里也曾是一个贫困村,村民的文化水平有限,对未来的发展缺乏规划,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时,政府组织他们与大学教授对接,组织他们到国外考察,开拓了他们的视野,也为他们很好地规划了未来发展方向,促使他们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盐丁村也并非没有过尝试,但是缺少了引导与扶持,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

其实,盐丁村还是有好的资源,例如保留着很好的古盐田以及石头砌成的盐库房。但要让这些资源变成产业,需要政府的帮扶。

(本报那大8月25日电)

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对接,学习工艺品设计、市场营销等。去年,又组织村民飞赴菲律宾巴厘岛的木雕村、银器村学习。

今年,儋州市又拨出专款500万元,在铁匠村建设一个集加工与销售于一体的工艺品商业街。步入风格古朴的商业街,只见21间农家展室排列两侧,陈列着手镯、凉席、佛像等木制工艺品,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到村里批发产品。

“这些木制工艺品,就是铁匠村村民的主要产业。”铁匠村村委会主任李巨川说,依靠制作工艺品,村里个人资产达到亿元的有1户,千万元有5户,百万元则有80户。

“这一阶段,铁匠村从过去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创业。”李巨川说:“一根筷子易折,但是一捆筷子则很坚固。铁匠村算是真正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阶段。现在花梨木原材料紧俏,在政府的引导下,我们也在尝试做椰雕和石雕。”

(本报那大8月25日电)

购原材料,打开销售市场。

“我曾经在湖南买原材料时,盘缠被窃,那时没有电话,只好一路乞讨,后来被一位好心的婆婆收留,借了钱,才得以还家。”村民李良才也是村里最早做工艺品的人之一。他说,现在做工艺品年纯收入有十几万元,那次经历却记忆犹新。

1980年代到2000年左右被铁匠村人称为探索阶段,村里人经历过玳瑁、牛角、海铁树等工艺品的尝试,积累了经验。“2004年,村里人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海南特色的花梨木工艺品。每周六,300多人一起坐上汽车到海口,住一晚,第二天就在东湖的一条小巷里摆摊叫卖。”李良才说。

那条街,如今已经成为有名的海南花梨木一条街,每周日开市。铁匠村也因此而正式发家致富。

2010年至今,铁匠村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儋州市将铁匠村作为“一村一品”示范村进行打造,安排工艺能手与海

工艺品。铁匠村的村民在打磨精美的花梨木。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村李国定说:“关键是穷则思变,既有农民自己敢闯敢试的精神,也有政府的引导扶持。”

李国定是铁匠村发展工艺品的第一代创业者之一。“18岁,我就开始打铁。到了1980年代初,开始机械化作业,打

铁已经不赚钱了,我们需要产业转型。”李国定说:“我当时在三亚,看到玳瑁工艺品很好卖,于是开始尝试。”

创业阶段,路子并不好走。30多年前,许多海南农民还未到过大城市,李国定就已经坐上火车到沈阳、北京等地,收



盐丁村的古老盐库早已废弃多年,破败不堪。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只有几分。因为靠海,世代以打鱼、晒盐为生。以前,盐丁村算是富裕村,村子里的上百座石砌盐库还能隐约看见当初的繁荣。

而现在,没了产业,盐丁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2100元。年轻人都已经外出打

工了,留下的都是些老人,中年人也不多,已经成了“空心村”。

听说,有人想把盐丁村打造成为旅游景点,我们也想转变产业,发展旅游。但是,村里的基础设施很落后,村道已经破旧不堪,一下雨就积水,因为没有排污

沟和垃圾收集池,所有的污水和垃圾,都流进了村中的小池塘,臭气熏天。

还有进村的道路,如果要发展旅游,那条路太窄了,只能让一辆车子通过,如果碰到两车交会,其中一辆就只能倒回去让路。(本报记者况昌勋 采访整理)

不能晒盐,我们何去何从?

农民呼声

时间:2013年8月19日

地点:儋州市峨蔓镇盐丁村

人物:村民羊春爱

日子,过得还是比较艰难。我70多岁了。年轻时,丈夫外出打鱼,我在家晒盐。那时候鱼儿多,每年能打到几十斤的小海鱼,晒盐,每年能晒1万多斤,收入不少,日子过得挺好,1980年代,盖了新房。

到了儿子当家,还是像他父亲那样,驾着5米长的小木舟,出海打鱼。但是鱼儿已经不多,有时候能够打到几斤、十来斤的鱼,有时则空手而归。现在,空手而归的天数,越来越多了。

如今,媳妇也没有工干,在家里种几亩地。由于干旱,只是种些番薯等。有一个孙女,19岁,已经外出打工了。

家里收入少,房子很破旧了,但是没有钱盖。

人物:村支部书记李生华

盐丁村,520户,2717人,人均土地

评论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王勇

传递正能量需要民间公益组织突围

来论

公共事件真相别被媒体推着公开

近期,有两起涉警事件令人难以释怀。一起是网曝宁夏海原县交警执法“打人事件”,一起是河南林州市公安局民警“摔婴事件”,两起涉警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事件发生后,首先捂盖子,隐瞒真相;然后媒体公布证据,调查才深入,真相才得以公布。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调查和公布事件真相都是被媒体推着走。

比如,网曝宁夏海原县交警执法时打人,中卫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中卫”回应称“没有打人”、“微博爆料不属实”、“发帖人报警后遭二次殴打更属无中生有”。网友公开打人视频,媒体追问真相,“平安中卫”删除了原来的微博,重新公布真相,回应辞退辅警,处分相关负责人。

而河南林州市公安局民警郭增喜“摔婴”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应追究刑责,但林州市公安局开会研究决定用“家法”处置——关禁闭15天。直到法制晚报追问真相,林州市公安局想“摆平”法制记者无果,才追究郭增喜的刑事责任。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媒体追问真相,两起涉警事件的真相恐怕就成了罗生门,受害者无法讨回公道,公众的知情权也被漠视了。

那么为何总有人习惯于掩盖事件真相呢?林州市公安局局长承认担心“影响形象”,所以把事情压下来了。海原县纪委、监察局调查组认为“调查事实不准”——这不是“平安中卫”微博最初否认打人的真相吗?当下海原县调查组公布“调查事实不准”的信息太少,难以说服人,笔者怀疑海原县公安局仍然没有亮出最初隐瞒真相的底牌,当然目前的结果比当初隐瞒真相要合理得多,基本能平息舆论情绪。

这两起事件基本符合公众对执法权的监督愿望,可以说基本上算过去了,但是,这两起事件带给警方的反思远没有过去,带给社会的警思远没有过去。最值得关注的,是怎样监督手握执法权的公共部门,总不能都由媒体推着走吧。

笔者认为,公共部门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诚信和公信力,没有这两点,所有的“形象”努力都是妄想,反过来还会因为捂盖子损害形象,其结果是得不偿失。

(王捷)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邮箱:hnrpbl@163.com



饶思锐

“海南省郑桓公文化教育基金会(筹)定于8月24日向今年被一本院校录取的海南籍学子发放奖学金,向被二、三本院校录取的郑姓学子发放助学金。”日前这则传递“郑”能量的慈善助学长微博在海南网友群中热议、热传,微

博发出不到1小时,阅读量就已达到1万多。与此同时,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罗马村重整80年前的“罗马村教育基金会特别捐赠”,我省重教助学蔚然成风可见一斑。

捐资助学、扶贫济弱,数千年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美好传统风尚在今天被不断延续和发展,这使得民间公益事业有着良好的基础。

如今,以企业、宗亲、协会、个人为主体的民间公益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极大发展和壮大了公益事业,成为了官办慈善之外的有益补充。但长期以来,受制于慈善机构要官办,民间不能办或

很难办等因素,大量民间慈善甚至属于“非法行善”。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四类社会组织的申请登记将放宽,民间公益组织的成立、登记条件更加宽松。藉此,民间公益的正能量才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但是民间公益事业的持久健康发展仍系于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

如何进一步细化引导和规范民间公益组织和公益事业,促使其发展壮大和规范运行,进而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是当前摆在政府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大量的民间公益组织由于存在着机构不健全、监督机制缺乏、专业性不够等问题和局限,其透明度一直被饱受质疑。随着

国家政策的变化、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提升,更多民间力量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如何保障这些爱心人士善款尊重其初衷,不被蛀虫所吞噬就显得尤为重要。

法律之外,行业自律也是增强民间公益组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猫腻”,公开、透明已经成为民间公益组织生存底线,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借助媒体和网络监督,自发在网上公开各种善款收支情况,加之其专业化、规范化的慈善操作,从而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增强了其公信力和生命力。同时,民间公益组织的日趋公开、透明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和促进了

官办慈善走向透明、公开和自律。

有人说,慈善事业的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志。而民间慈善事业的发达与否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标志。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需要政府部门引导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发挥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将一些非基本的社会事业应当交给社会和市场,而政府只负责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感,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信任,营造互帮互助、人人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期待学生减负不再“画饼充饥”

王勇

“小学不留书面家庭作业”、“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近日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引发各方热议。我省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也纷纷表达意见,希望学生的负担能真正减下来。(据南国都市报报道)

从阳光入学到均衡编班,从不留作业到等级评价,从严禁补课到强化监督……客观上说,《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为小学生减负做出了很多科学的、硬性的规定,便于操作,有利于将减负落到实处。

然而,这项本意是为了把小学生从沉重的课业负担中拯救出来的规定,却给很多家长带来新的忧虑:如果应该指

挥棒不变,减负能否落实?是否会出现“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的现象?当然,家长的担忧也并非多虑。毕竟,近年来“减负令”、“禁补课令”一个接一个,却屡屡流于形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负担越来越重,已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虽然教育问题总能引发“全民焦虑”,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因此否认教育部门给小学生减负的初衷和诚意,不能忽视教育部门为此做出的积极探索。如其苛求和埋怨新规,不如理性思索,不如大家集思广益完善新规。

小学生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修正教育理念,改革教育制度,尤其是在教育评估机制、升学考核机制、人才考评机制等方面,做出科学、合理和必要

的革新。期待在出台减负令以外,教育部门还能出台其它配套措施,让减负与中考改革尽快实现对接,让教育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只有素质教育深入人心,教育资源配置合理,学校才“只有远近之分,没有好坏之别”,家长才能消除“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心态。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要教改方向坚定不移,公众不妨多些耐心、少些不放心,让工作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只有这样,减负才会不再是“画饼充饥”。



代,并非一日而成,成人后很难改变。一个孩子如果是在父母和他人的鼓励和赞美中成长,他容易形成自信的性格;反之,在充满呵斥和贬低声中成长容易形成自卑心理。

——杭州采荷三小老师任智康在对4所小学男生做了两年调查后认为,专制型教育会让男孩娘娘腔

(陈实 辑)



时事图说

陕西省兴平市日前被媒体曝光,指其交通管理部门将“电子眼”外包给私营企业,企业雇用人员上路坐在测速车里拍照,每人每天查超速指标50辆,每月完成指标发给工资,超出指标再拿提成。

监控电子眼这一科技产物,原本最尊重真相、最客观公正,可以让任何违规违法行为都“尽收眼底”。但“每天

50辆指标”,让公众产生疑虑,“电子眼”是否也会被金钱所蒙蔽、受利益所左右?

“电子眼”外包模糊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将执法行为变成逐利行为,将权利衍生商品,它的存在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也让执法部门的形象大打折扣。

(文/王平 图/薛红伟)

声音

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不是以大为荣,而应该兼容生态、宜居、产业发展和交通等因素,建设绿色、环保、紧凑的中小城镇。

——中国工程院院士、设计专家何镜堂建议,城镇化应积极建设中小城镇

在北欧一些国家,人们在一个星期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依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哪怕经济增速低一点儿,如果每年能增长6%,到2030年,我国就可以实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的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将迎来休闲经济时代

人的自卑性格往往来源于童年时